

城东三坊墙弄

金烈仁

缙城三坊墙弄在东门。东门三大姓:袁、黄、王,三坊墙弄一带区域为黄氏族人的聚居地。志书上写道:三坊墙弄,南起东大街,北至环城北路,长280米,宽1.5至2米,卵石路面,该处原有三座牌坊,古称集三坊,因名三坊墙弄。

三坊墙弄是一条笔直的路,路的两侧,有着高高围墙的民居鳞次栉比,与桃源桥一带的繁华喧嚣相比,这里宁静安详,并且洁净典雅。路边有一口古老的水井,看上去,黑乎乎的。在缙城的多个地方,这样的古井让人难以忘怀。

三坊墙弄在缙城之所以有一定的知名度,那是因为此坊间,有着不少的美丽传说,有些则是真实的人文与历史。三坊墙弄,缙城第一所近代小学——栢屏小

学就建在此地。据记载,其为光绪年间进士黄和奎与族人黄方珪建于1901年。取名为栢屏小学,原因是三坊墙弄的黄族称为“栢屏黄”。说起“栢屏黄”的由来,又是因为黄姓高祖乃南宋期间自福建迁来,曾在他的居所庭院栽种12株栢树,并列如屏凤,后人就称之为“栢屏黄”。南方人“黄”“王”同音,这正好与毗邻的“塘心王”区别开来。

三坊墙弄一带的黄氏家族崇尚文化,多有书香门第,历代有学子才俊金榜题名。古有“一门三进士,五代功臣第”佳话流传于今;近有黄正铭、黄寄凡等才子为缙城人所乐道。黄正铭小时毕业于栢屏小学,后为台大政治系教授,因学术成就蜚声中外,台湾蒋氏题书“清勤树绩”,现此匾悬挂于宁海黄氏宗祠。黄正铭与浙东才子黄寄凡的老宅,就在三坊墙弄当中的位置。

三坊墙弄边上有一个大东门颇有特色。缙城有所谓“柱脚不落地”的建筑就在这里,据传只有功勋显赫的家族才能享受这份殊荣。明万历年间,有象山人邵景尧赴京城赶考,途经宁海得病,被黄氏族人黄思轩救起,并帮其进京,后官至礼部右侍郎。他为报答恩情,赠有“诗礼传家”匾额和“五代功臣第,三朝礼学门”柱联。后据此建大东门于三坊墙弄边上。

东大街北片旧城改造如火如荼,旧貌换新颜。有着厚重人文的三坊墙弄也即将消失。



留住缙城记忆 县征收办联办

冠庄拔贡潘采田与《冠庄潘氏宗谱》序

潘国贤

拔贡,明代泛指选拔贡生之制。清初定为五贡之一,每6年一次。冠庄人潘采田(1753-1839),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考选上拔贡。

据《冠庄潘氏宗谱》2014年第四次修编本资料:潘采田,生乾隆十八年,卒道光十九年。乾隆己酉拔贡,选授新城(属杭州府)教谕。经史之学,夜不分倦。尝勒座右铭曰,三德六行有愧,五经四书死方休,并书此垂训。

上述内容部分老县志亦有载之,同时记载潘采田著作《愚叟资暇录》、《渊鉴述指》、《易经精义推指》等。

县文史专家严伟于2014年为《冠庄潘氏宗谱》续修,在黄坛后王村严才达“益善堂”老宅中,发现潘采田在道光十八年(1838)撰写的《兰玉盈庭》匾额。匾文为:戊戌夏,余游甥厅事,见其花木缤纷,鱼鸟驯适。因与客弹棋酌酒于其间,欣然如披群芳之谱,人聚景之园,谢幼度所云,兰芝玉树,生于家庭者不当为甥祝乎!故乐为之跋。八十六叟愚舅潘采田拜题。

严伟又撰文:黄坛益善堂为宁海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道光年间,益善堂主人与冠庄贡生潘乾珪家族关系非常密切,潘严二家是亲上加亲。益善堂内保存着潘采田手书匾额,《黄坛严氏宗谱》载有潘采田诗词,为研究地方史的宝贵资料。

潘采田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续修的《冠庄潘氏宗谱》序文,译成白话文大意:乾隆己卯年(1759)由象山姜白岩(1736-1813)先生竭力谨慎为我族修成首部《冠庄潘氏宗谱》,迄今有六十年了。现在族人商议点定邀请我编纂本族续谱之事。要顾及到先贤传统,就排列四卷、八目,谱册序文为首卷,其次世系明确分支;世略

记载卒葬;世福记载崇祀典;世德以追本溯源,记载好人善事;世秩记载族中当官人;世藻记载族人或外族人的诗文和杂记。下至有德妇人、外来养子、僧人道士等人,一视同仁,不可遗忘,做到尽善尽美。

我不敢更改先人修谱版式,宗谱有续谱之名,书籍有续集之称,自古有之。唐朝司马贞(679-732)撰的《三皇本纪》补充西汉司马迁(前145或前135-?)撰的《史记·龟策列传》。还有东汉桓君山(前23前后-56前后)撰的《新论》、班固(32-92)撰的《前汉书》和仲长统(180-220)撰的《昌言》的史书,均是同样的意义。不是我聪明,所以说将六十年后续六十年前的宗谱,谁说不可以呢?何况我与姜白岩先生更有历时长久的感情,先生修本族谱时,我年少七岁,正在启蒙教育中,读先生《竹枝词》作品时,常以清亮之声念诵。长大成人后,戊戌年(1778),拿了自己的文章欣然前往拜谒先生,敬请赐教指正,并和先生共叙回忆在冠庄修谱时光,此时,先生以儒士之言勉励关心我晚辈。但宗谱能否修成忧心忡忡,嗟叹不已,如果不成,则愧疚于姜先生。后来,姜先生归西,我只能捶胸顿足哀悼叹息,续谱之责不可避免了。

不过,经几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续谱编辑,但也是为本族桂苑琼林,家族兴旺,光宗耀祖的责任,寄望于子孙后代勤奋向上,弘扬光大的事情。

我们的众多先人,为家谱文化传承发展付出不懈努力。谱牒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氏族发展、地方史、国史等方面的研究编纂,具有不可缺少的原创性。

【史海钩沉】

立宪运动中的宁海人蔡裔麟、童伯康、叶颂清

王灵恩

咨议局,恐怕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然而在清末,它确是一个热捧的词汇。是时,清廷高调新政,预备立宪,咨议局应运而生。稍类似于西方地方议会机构的咨议局,实际上是在省抚部院直接领导之下的舆论代表或代议机关。咨议员的头衔也很新派,能置身其位的不是鸿儒耆宿就是名绅名士。每府按人口比例配额选举,基本标配为每县必选配一员。

浙江咨议局在宣统元年(1909)成立。首批117位咨议员当中,就有一位叫蔡裔麟的宁海人,他是台属宁海的民意代表。身处立宪自治浪潮中的宁海人,还有童建侯、叶颂清诸君。

1908年11月13日《申报》题为《各省筹办咨议局……二十四》云:“筹办处议定每府设分参议一人。昨日,台州旅杭同乡会由叶子布君发起为公举分参议事。俟清泰门首长庆寺内开会,军学界到者仅数十人,提议台州内地未曾选举分参议,可否由旅杭军学界五六百人中选举分参议一人。嗣由池子干君言,今日到会仅属少数,未便议决,应立即发电至台州各界,俟复电后,再行定夺。杭州分参议员闻已由卓守芝楠,商同各巨绅推举某绅,日内即将揭晓。”

此则新闻所云的就是浙省筹办咨议局的事,事主叶子布即本邑力洋人叶颂清。叶颂清,字子布,号道根。当时他在浙江陆军小学堂任提调,属浙江清军中下级军官,在杭垣台州人中颇具人望。

1909年3月20日《申报》之《各省筹办咨议局……四十三》所载:“又闻永嘉县初调查册颇觉模糊,且多遗漏,司选员童伯康于十一日到境,正册仅造十余张。童君深为惶急,乃谒盛令请派书吏十余员,日夜赶造,于十六日告竣。十八日,始将总分榜写成,分贴各区。现在童君总将记事簿中查对其有嗜好者,无论已戒、愿戒、在戒各员,均另造一册,申送府县。又请盛令再派名誉审查员,复查酌结公费。”

另一则1909年5月30日《申

报》之“各省筹办咨议局……六”所载:“永嘉县初选举定于四月十五日投票,十八日开票。恐放弃选举权者之多,特先期于四月初一日下午一点钟在郡城隍庙开会演说,到者三百余人。先由初选监督熊令宣告开会宗旨,次由司选员童伯康演说咨议局议员与国家人民之关系,郑伯鸿君演说咨议局议员与地方人民之关系。”

两文事主童伯康,即民初宁海县首任知事童建侯,本邑前童人,与童保喧、童一秋一起,并称前童“三伯一秋”。当时他作为省调查局调查员派往温州永嘉,成为一名指导协助永嘉县选举咨议员工作的司选员。据清末《浙江官报》宣统二年(即1910年)第13-16期《省城各署局处所职员一览表》记载:童建侯,浙江宁海,法政毕业,浙江省调查局外府调查员。为当时清末省抚署机关里唯一的宁海人。

而宁海名绅深剡大蔡人蔡裔麟,晚清岁贡出身,曾任象山县令,是宁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省咨议局咨议员。他曾是咨议局24名常选分参议,可否由旅杭军学界五六百人中选举分参议一人。嗣由池子干君言,今日到会仅属少数,未便议决,应立即发电至台州各界,俟复电后,再行定夺。杭州分参议员闻已由卓守芝楠,商同各巨绅推举某绅,日内即将揭晓。”

而翌日的《申报》之《浙江咨议局审查会纪事》云:初八日上午,咨议局全体议员在事务所集议,并不发给旁听券。续选各股部长,当选第一股部长蔡霖、第二股张棣、第三股蔡汝霖……

同日《时报》的《浙江咨议局纪事》也有类似报道。从中可窥见咨议局开会之一二,如涉及各项选举事宜、审查各种议案、讨论抚台方面的有关议题,无论政治法律,还是社会民生,凡此种种,无不容纳。当时的议员也比较敢于直言,甚至向议长发难追问,这也算是清廷迫于情势顺从民意,为驾驭民风而所谓开禁肇始时期特有的样貌。

尤需提及的是,蔡裔麟作为浙江立宪派的中坚与骨干,他与其他53名咨议员一道,联名参与浙江保路运动的陈请活动。1910年9月7日《四明日报》的一则《咨议局呈请开临时会议》新闻是这样报道:“浙江咨议局议长陈戴宸,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议员叶浩书、蔡裔麟、刘耀东、管穰、王序宾……谢元寿、张美湖为呈请事。查《咨议局章程》第三十三条内开“临时会于常年会

期以外遇有紧要事件,经督抚之命令,或议员三分之一以上之陈请,或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之联名陈请,均得召集,其会期以二十日为率”等语。窃自浙省铁路几经艰巨困难,始达完全商办之局,当拒款事起,贩夫竖子以及劳动食力之輩,莫不争先认缴,万众一心,集股得逾千万之巨。七月十九日,总理汤寿潜奉旨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人民闻信,惶骇异常。金以浙路本属商办,总理系由民选,汤寿潜以言获罪,非以路获罪,朝廷罪汤寿潜并非罪及于路。总理不准干预路事,则商办不完全。邮部飭令另举总理,则民选为无效。投资者俱莫明理由、各府州县团体及旅居外省绅商纷纷集议,函电到局,日必数十起。其他劳动食力之輩,传闻异词,误会殊甚,类皆以为血本无着,愤懑不平。凡此情形,亦殊可虑。本局立于代表舆论之地,内疚人言,外虑暴动,应视为紧要事件,呈请召集临时会议。议员赞同陈请者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适符局章三十三条之规定。况业奉抚部院定八月初一日为常年会召集之期,早经行知各属,亦较临时召集为便利。理合呈请抚部院鉴核,酌定日期,札行到局,俾得预备。为此合词,呈请抚部院迅予施行,须至呈者。”

当时,浙江绅民挽汤挺扬的呼声十分强烈,这次由咨议局正副议长领衔发起,共有54名议员联名挽留浙江铁路公司原总理汤寿潜向朝廷及浙江巡抚呈请,声势可谓大矣。汤在浙路事件名声大噪,与四川保路运动遥相呼应,让他积攒足够的人望资本。他本身就是政坛耆宿,学术名望也极高,再加上这次保路运动,这为他日后成为辛亥年浙江光复后的首任都督和民国临时政府首任交通部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次声势浩大的浙江保路挺汤浪潮,议议员裔麟功莫大焉。

【名人轶事】

期以外遇有紧要事件,经督抚之命令,或议员三分之一以上之陈请,或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之联名陈请,均得召集,其会期以二十日为率”等语。窃自浙省铁路几经艰巨困难,始达完全商办之局,当拒款事起,贩夫竖子以及劳动食力之輩,莫不争先认缴,万众一心,集股得逾千万之巨。七月十九日,总理汤寿潜奉旨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人民闻信,惶骇异常。金以浙路本属商办,总理系由民选,汤寿潜以言获罪,非以路获罪,朝廷罪汤寿潜并非罪及于路。总理不准干预路事,则商办不完全。邮部飭令另举总理,则民选为无效。投资者俱莫明理由、各府州县团体及旅居外省绅商纷纷集议,函电到局,日必数十起。其他劳动食力之輩,传闻异词,误会殊甚,类皆以为血本无着,愤懑不平。凡此情形,亦殊可虑。本局立于代表舆论之地,内疚人言,外虑暴动,应视为紧要事件,呈请召集临时会议。议员赞同陈请者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适符局章三十三条之规定。况业奉抚部院定八月初一日为常年会召集之期,早经行知各属,亦较临时召集为便利。理合呈请抚部院鉴核,酌定日期,札行到局,俾得预备。为此合词,呈请抚部院迅予施行,须至呈者。”

当时,浙江绅民挽汤挺扬的呼声十分强烈,这次由咨议局正副议长领衔发起,共有54名议员联名挽留浙江铁路公司原总理汤寿潜向朝廷及浙江巡抚呈请,声势可谓大矣。汤在浙路事件名声大噪,与四川保路运动遥相呼应,让他积攒足够的人望资本。他本身就是政坛耆宿,学术名望也极高,再加上这次保路运动,这为他日后成为辛亥年浙江光复后的首任都督和民国临时政府首任交通部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次声势浩大的浙江保路挺汤浪潮,议议员裔麟功莫大焉。

【史海钩沉】

“为骨而香”严子陵

葛志德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严子陵是无补于世的罪人!朱这样评严,显然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但翻开历史,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关于严的历史记载,三家史书都写到刘秀与严一起“游学”。所谓“游学”就是“远游异地,从师求学”。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就是“老同学”。刘秀打下了江山,百废待兴,亟需人才襄助他治理这个饱受兵灾戕害的国家,于是,刘秀“安车玄纆”,去接他,可他“三反而后至”。来了之后,封他做大官,但他还要跑。人说“士为知己者死”,他连一个“士”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刘秀是个昏君,你不想为虎作伥,这还说得过去,可是刘秀是难得的明君。毛泽东主席称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选拔士人,充当各级官员……人说,“君明奸侯远”,以此判断,严至少有小人之心。

有的文章说刘秀封严的官不够大。袁宏的《后汉纪》中说,“天子欲以三公”。“三公”还不大,让刘秀把皇位让给他?像这样身无寸功的人,这官已不能再大了。所以“官封得不够大”的理由应该排除。

有人说严与司徒(宰相)侯霸合不来,或瞧不起他,不想与之同朝为官。两人先前是老朋友,人家官做得大,嫉妒?还是侯的才不及严?翻开史书,侯是一个人物!因功绩卓著,封关内侯。侯的唯一污点是新莽时任过淮平太守。任过伪职就要被一棍子打死吗?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刘邦以韩信为将,没有一点气度,如何干大事?有篇文章说严是学黄老之术的,因此他不想做官,喜欢“钓鱼”。这恐怕是为严不仁不义,冷酷无情作遁词,史书上也无此记载。

严到底学什么的呢?我想他应该是习儒的。

下说,阿谀顺旨要领绝”的话来看,他主倡的是仁义。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阿谀顺旨”是儒家极力反对的。

再从历史上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只有儒术一花独放。由此推知,严与刘秀只能是太学里的同学,他们研习的也只能是儒学。可是儒家是积极入世的,如孟子“达则兼济天下”,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们的一生都致力于以礼治国,建立“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而严呢?他是消极遁世的,他学的是治国之道,碰到的是明君,所处的是明世,并且让他做大官,让他大显身手——这是所有儒生梦寐以求的良机,可他却不顾老同学的情面,不顾国家兴废,不管百姓的死活,居然跑去“钓鱼”!

这时候,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严会不会是惧怕真龙的叶公?抑或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记录:严说错一个历史典故“巢父洗耳”。

这令我想起一个故事:千金买骨。刘秀是个极其睿智的皇帝。他平定天下,急需大量的“千里马”助他治国理政。如何得“马”?于是他想到了这位年已七十五岁高龄的老朽、老同学,让他充当千里马的骨头,上演了一场四征严子陵的双簧闹剧,以此树立自己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形象,来招揽天下贤才。

这虽是个猜想,但严子陵确实是起到了“死马骨”的作用。后来刘秀帐下,人才济济,东汉江山很快就得以巩固和发展。范仲淹说得对:“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这个双簧戏,使刘秀名利双收,也让严这块“千里马的骨头”为骨而香,并且香到现在,或许会永远香下去!

【有一说一】